

文坛战

中国留日作家 观照日本的

主 编 靳明全

副主编 杨小雷 郎艳丽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中国留日作家观照日本的 抗战文学

主 编 靳明全

副主编 杨小雷 郎艳丽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留日作家观照日本的抗战文学/靳明全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13.3

ISBN 978—7—5531—0208—5

I. ①中… II. ①靳… III. ①抗战文艺研究—中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374 号

中国留日作家观照日本的抗战文学

zhongguoliurizuojiaguanzhaoribendekangzhanwenxue

主 编 靳明全

副 主 编 杨小雷 郎艳丽

责任编辑 陈 红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 行 科 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总 编 室 电话:(028)862593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9.875

字 数 3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208—5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84122206

前言

从传统文学向近现代文学的转轨历程中，中国迟于日本 30 年左右，这就形成 20 世纪初期中国留学生大都选择了日本。学成归国，这批留日学生叱咤中国现代文坛的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穆木天、成仿吾、刘呐鸥、李叔同、曾孝谷、陈大悲、徐半梅、欧阳予倩、田汉、夏衍、胡风等名人。这些名人的文学创作莫不观照日本，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日本现代文学有诸多相似因素，这也就是本著所称的“观照”。进入抗战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基本断绝。爱国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曾留学日本的著名文人，纷纷拿起笔以文学形式投入了抗战。抗战对象是日本，抗战文人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观照日本，尤其显示出针对性、现实性。所以，具有这种特点的抗战文学至今仍然激励着有血性的中国人和深于反省的日本人。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留学日本的许多中国作家成为了抗战文坛的中坚，观照日本创作抗战文学成就突出者有：郭沫若、夏衍、郁达夫、田汉、胡风、冯乃超等。这些留日生的抗战文学有以下四个特点：（一）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坚定地反抗日本

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二)宣传抗战,对日本人形象的情感指向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表现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愤怒;再现对日本故友之恩怨;担忧日本的至亲;鞭挞日本人的劣根性。(三)深刻剖析日本社会,不断反思日本文化。(四)描绘日本地理、人文景观作出军事战略阐释。以上四个特点,使中国留日生观照日本的抗战文学视野具有世界性、广阔性,反抗对象具有针对性、具体性。由于这批留日生在中国抗战文坛地位重要,他们观照日本的抗战文学为抗战文化的建构发挥了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目的特殊的一页。系统地为之研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

本著以郭沫若、夏衍、郁达夫、田汉、胡风、冯乃超等六人为研究对象。

《郭沫若抗战杂文的日本论》提到:抗战伊始,郭沫若旋即辗转回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尽管创作环境恶劣,但他一直坚持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激情昂扬、气势磅礴的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入在《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和《沸羹集》中,涵盖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少直指日本。强烈谴责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径,鼓动全民抗战;生动刻画日本人群像,揭露日本军部飞扬跋扈、残暴无情的丑恶嘴脸;深入剖析日本社会,研究与回顾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反思日本民族的劣根性;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曾经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所具有的鲜明政治立场和丰富情感世界。

一般认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史剧采用了“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借反秦之名,实际反对蒋介石政府。若单从剧情和台词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郭沫若史剧的反秦主旨再研究》作者通过仔细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及郭沫若的思

想状态，发现这些作品的主旨其实是鼓动全面抗战。与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相比，郭沫若与日本的关系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他的祖国深受日本侵略，另一方面他又曾在日本留学、避难，还娶了日本妻子安娜，这些关系都深刻影响了他对日本的情感指向，或许用爱恨交织来形容比较恰当，但总体上经历了对日本由“敬仰赞美”到“蔑视憎恨”的情感变化，《郭沫若〈归国杂吟〉诗情感的日本指向》一文如此说。

《〈法西斯细菌〉中的静子形象》的作者指出：在夏衍塑造的所有话剧人物中，《法西斯细菌》中的静子是非常特殊的日本女性，但长期以来她没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嫁给中国人的她，温柔善良，知书达理，深爱丈夫和孩子。抗战期间她追随丈夫来到中国，由于血统关系没有对日本充满仇恨，后来血的现实让她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面貌，就转而支持丈夫参加抗日活动。这个人物的塑造，体现了夏衍话剧注重人物心灵冲突的艺术特色，借助日本平民的视角鞭挞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夏衍的话剧暗示我们：要正确区分无辜的日本平民和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

在夏衍众多的戏剧作品中，《离离草》不为人所关注，原因在于评论界一致认为《离离草》中主要抗战人物形象的塑造颇显单薄，缺少力度感。然而《〈离离草〉中的日本人形象》作者却认为真正让《离离草》备受冷遇的原因是夏衍在“众人说鬼”的时代潮流下，塑造了一个与民族心理不相符的日本人形象——六平俊吉，而正是因为六平俊吉的存在才让《离离草》在众多的抗战文学中脱颖而出，显出不一样的光彩。

《日本的悲剧》是夏衍在1937年出版的一个杂文集，其中包括了《日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的悲剧》等六篇文章。在书中，夏衍通过细致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其国内的

社会状况和士兵士气，总结出一个结论：“那个时代的日本是个悲剧的时代”，使人感到的只是无法排遣的怜悯和悲哀。《一个文化战士的抵抗和悲悯——浅谈夏衍〈日本的悲剧〉及其对抗战的意义》文章意义在于指出：侵华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灾难，必须鼓励国人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夏衍虽然在戏剧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但他在上世纪 20 年代却是从翻译外国文学走上中国文坛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他翻译的三部日本作品《未死的兵》、《三兄弟》以及《敌兵阵中日记》非常适时地配合了全民抗战，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我们从《夏衍译介〈未死的兵〉、〈三兄弟〉及〈敌兵阵中日记〉》文中看到夏衍具有的民族大义和人道主义情怀。

在抗战时期，郁达夫大量著文对日本文化、生活、文人、妇女、军阀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中我们可以感知郁达夫对日本的真情实感，又可见到抗战时期的日本众生相。《郁达夫抗战散文中的日本剖析》文章用形象学的方法挖掘出人物形象背后潜藏的日本社会、政治及人的价值观因素。

《抗战初期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之决裂》文章指出：对郁达夫来说，不管受到佐藤春夫小说影响有多么的深刻，也不管对他那种忧郁颓废的气质有多么的感同身受，在侵华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境遇下，最终两人关系还是破裂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佐藤春夫之类的日本知识分子表面上是“文学报国”，其实他们没有原则地歌颂侵略战争的行为是文人失节的有力表现。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异化的产物和牺牲品。

《郁达夫论武者小路实笃的“绝计”》文章分析到：作为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曾经是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优秀作家，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他逐渐演变成为狂

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并于1942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亚战争私感》，赤裸裸地宣传侵华思想，美化侵华行为。对此，郁达夫撰文《倭敌已在想绝计了》分析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军民的厌战心理以及中国的抗战情况等，痛斥实笃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1940年初，郁达夫在新加坡收到了日本文艺评论家新居格的公开信原稿——《致郁达夫君》。在信中，新居格除了叙旧之外，还认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不应该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期待中日两国文人能够有比以前更加亲密的交流与合作。郁达夫即做出回应，以《敌我之间》为题撰写一篇小文发表在《星洲日报》上，对新居格来信的观点有所认同，但更多的是郁达夫提出的为抗战服务的文艺观。《郁达夫与新居格的通信研究》一文如是说。

田汉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抗战文学作品，其中有很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日本兵形象，一方面为我们现在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日本兵作为他者形象，也是作者当时情感态度的一种投射，代表着一种集体无意识想象。《田汉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兵形象》文章指出：如今在和平年代，究竟如何在作品中塑造日本人，甚至如何在现实中对待日本人，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田汉抗战戏剧中的日本观照》提出：田汉的戏剧风格在上世纪30年代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人形容是从唯美、颓废和感伤的风格转向关注现实、追随时代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些风格的形成，如果仔细探究根源，可以发现存在日本影响的因素，比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在《获虎之夜》、《回春之曲》等作品中有所体现。《抗战与戏剧》这本书由田汉等人集体创作，主要探讨如何使戏剧在抗战中发挥更好作用的方法和途径。从书名可以看出，把“抗战”这个政治概念和“戏剧”文学放在一起讨论，

实际就隐含着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这这也是一个中国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抗战与戏剧〉析》一文强调：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观点应该占据主流地位。

胡风和日本作家志贺直哉在艺术创作论上有共通之处，两人都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为生活实践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但在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志贺偏重于追求真诚的内心世界，胡风注重以现实生活经验塑造人生艺术。《胡风〈略论文学无门〉与志贺直哉艺术创作论》作者认为上述之异同，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得到实证。

《〈七月〉编辑思想形成与胡风日本普罗文学杂志阅读经验》文章指出：胡风在编辑《七月》杂志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思想，比如：强调文学运动应该发挥启蒙教育作用，认为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具有精神层面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些思想的形成，与胡风在日留学期间阅读相关书籍及受到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紧密相关，特别是和日本文论家青野季吉的文艺观有密切联系。厘清这些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胡风及其当年的编辑思想，进而更加科学地对胡风的文学史定位。

《胡风抗战文论的形象思维观与秋田雨雀文论》的作者认为：胡风和秋田雨雀作为中日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具有不断探寻的价值。胡风与秋田雨雀的理论思想是“主观战斗精神”，这种思想不仅停留在他们文学创作层面，同时还赋予它深厚的内涵，表现了胡风和秋田雨雀作为文学先锋者的人格构建意识。

《冯乃超译介鹿地亘抗战文学》一文写到：抗战期间，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鹿地亘逃亡到中国，直接参与组织了在华反战运动，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创作了大量反战作品，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村记》。冯乃超把该文翻译发表，使国人进一步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从而积极投入到抗战之中。一个译本的产生，不仅仅是一次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交换行为，在其背后更多的还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相互形成一个共同的力场。上世纪30年代，冯乃超之所以选择译介芥川龙之介的文集，同样也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及个人兴趣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冯乃超译介芥川龙之介小说》文章重点论述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这些潜藏的因素展示给读者。

“七·七事变”不久，冯乃超发表了《进步的中国与退化的日本》，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愤怒。文章深刻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狂热好战，表达出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具有的顽强精神。《〈进步的中国与退化的日本〉析》指出：冯乃超上述文章虽然写法上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上述抗战文学的研究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亦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这种研究根植在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实际联系中。作为国际视野下的上述中国抗战文学研究，既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又联系日本文化，如此研究正是为消灭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改善后现代主义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等方面作的努力尝试，正因为是一种努力尝试，其中不乏幼稚因素也就不奇怪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郭沫若抗战杂文的日本论	(1)
第二章 郭沫若史剧的反秦主旨再研究	(15)
第三章 郭沫若《归国杂吟》诗情感的日本指向	(32)
第四章 《法西斯细菌》中的静子形象	(47)
第五章 《离离草》中的日本人形象	(63)
第六章 一个文化战士的抵抗和悲悯——浅谈夏衍《日本的悲剧》及其对抗战的意义	(76)
第七章 夏衍译介《未死的兵》《三兄弟》及《敌兵阵中日记》	(91)
第八章 郁达夫抗战散文中的日本剖析	(106)
第九章 抗战初期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之决裂	(124)
第十章 郁达夫论武者小路实笃的“绝计”	(138)
第十一章 郁达夫与新居格的通信研究	(151)

第十二章	田汉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兵形象	(164)
第十三章	田汉抗战戏剧中的日本观照	(177)
第十四章	《抗战与戏剧》析	(190)
第十五章	胡风《略论文学无门》与志贺直哉的艺术创作论	(203)
第十六章	《七月》编辑思想形成与胡风日本普罗文学杂志 阅读经验——试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日本渊源	(220)
第十七章	胡风抗战文论的形象思维观与秋田雨雀文论	(232)
第十八章	冯乃超译介鹿地亘抗战文学	(249)
第十九章	冯乃超译介芥川龙之介小说	(260)
第二十章	《进步的中国与退化的日本》析	(277)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靳明全		(300)

第一章 郭沫若抗战杂文的日本论

抗战伊始，郭沫若本着爱国主义的热忱，感到“又当投笔请缨时”^①，旋即辗转回国^②，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夏衍等创办《救亡日报》，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以一个英勇战士的姿态奔赴在文艺战线上。在“天翻地覆的时代”，敌人的狂轰滥炸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作家失去了创作“纪念碑式的东西”的“静谧的心境”，但郭沫若一直笔耕不辍，写下大量激情昂扬、气势磅礴的杂文，“不失为这一大时代的粗糙的剪影”^③。这些杂文主要收入《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和《沸羹集》里，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抗战直接关系日本，

① 作于1937年7月26日由日本归国舟中，最初发表于1937年8月3日上海《立报·言林》，后收入《归国杂吟》之二，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于本月25日启程回国，27日抵达上海，见龚济民等编《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增订版，第343—344页。

③ 《羽书集·第一序》和《沸羹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八卷、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再加上郭沫若稔熟日本文化，因而关于日本的论说是其焦点，如《我们为什么抗战》、《理性与兽性之战》、《忠告日本的政治家》、《“侵略日本”的两种姿态》、《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日寇残酷心理的解剖》、《鲁南胜利之外因》、《三年来的文化战》、《文化与战争》、《日本民族发展概观》等篇，强烈谴责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径，拆穿敌人一切矫饰的言论和阴谋，坚持日本必败的信念，鼓动全民抗战，呼吁国际援助；生动刻画日本人群像，揭露日本军部飞扬跋扈、残暴无情的丑恶嘴脸，描摹在军事统治下的日本士兵、政治家、儿童等人群的无奈心理和被扭曲的灵魂；深入剖析日本社会，研究与回顾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反思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以及在战声中追忆日本旧友和地理风情，并对日本民族的未来寄予期望，等等，展现了曾经作为一个留日学生的郭沫若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情感世界。

一 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行径，鼓动全面抗战

自日本挑起事端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来，肆无忌惮地侵占领土，屠杀民众，摧毁文化，各种凶狠残暴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郭沫若的杂文对日寇的野蛮行径作了赤裸裸地呈现、揭露与谴责：“日本侵袭我满洲，蹂躏我上海，夺取我热河，割裂我冀东，犹然不知满足，丝毫不想收敛它的侵略的狂势。……屠杀我无防卫、无抵抗的民众，而于我文化机构，尤狂肆摧残，逮捕我学人，枪决我青年，炸毁我学校，焚烧我图籍。这种狂暴的行为，就是未开化的蛮人都是不能做出的，而日本军部横无忌惮地，在二十世纪开明的今日，不惜一演再演地引以为快意了。”

(《告国际友人书》)日本军部在“速战速决”的迷梦破灭之后,惨无人道更加露骨,手段之残忍变本加厉,强盗面孔表露无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且闹到了杀人比赛的地步。就拿奸淫来说,说来已委实令人伤惨。八十岁的老妈妈,八九岁的小娃娃,都难逃他们的魔手”,并公开传播施行毒辣报复的残酷兽行,打算投掷细菌弹和伤寒病菌,要把所到之处的生命“一网打尽”(《日寇残酷心里的解剖》)。而日本对我们的文化侵略日日紧逼,早已设置“同文书院”^①等有形工具,“掠夺各种宝贵的研究资料和古物”;其教育体系所培养的日本人“把侮辱中国、侵略中国认为是它们的天职”;猛烈破坏我们的文化战线、文化机关和文艺阵地,炸毁学校,掠夺图书,并策动文化浪人和文化汉奸宣扬“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臭不堪闻的老调”,炮制各种奴化政策宣传机关和宗教团体,制造一个“百鬼夜行、群魔乱舞的世界”(《三年来的文化战》)。郭沫若以史记实录的笔墨再现敌寇的累累暴行,目的主要在于鼓动全民抗战,争取国际援助,因为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危机“犹如猛烈的霍乱、鼠疫,它在短时期内便要向全世界蔓延”,日本军部“老早便在梦想着成吉思汗的再来”,“梦想着再演出‘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所以我们中国人民,包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斗士,一切理智清明的国际的弟兄,都要提着正义之剑,“为保卫全世界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我们为什么抗战》、《告国际友人书》)。

为了摧毁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精神,日本军部抛出了许多

^① 全称为“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

虚假矫饰的言论，如“防共协定”、“保持东亚的和平”、“后清梦”、“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郭沫若对其进行逐一批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言论的虚伪和实质。对于“防止共产党”、“防共协定”，郭沫若怒斥：“这是最可笑的连小儿也骗不了的幌子”，因为共产党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参与政权处理事物，在国内提倡统一战线，巩固国防，共赴国难，又何须日本来“防止”？以“防共”为幌子的日本军部，夺取我们的领土，没收人民财产，是“最猛恶的一群强盗”，它才是我们应当共同防止的敌人。对于敌人要“保持东亚的和平”而自诩为“安定势力”，郭沫若怒斥：“这个幌子尤其令人发笑”，因为东亚的和平正是日本军部这一大群强盗来扰乱了的，我们中华民族素来嗜好和平礼让，不以暴力来侵袭过任何国家。对于“共存共荣”，郭沫若怒斥：“他们那种厚颜无耻的本领实在是世界第一”，“实行奴化教育，输入吗啡、鸦片、红丸、白面等毒药，不择手段地企图腐化、灭绝我们种族”，“这就是敌人所说的共存共荣的真相啦”。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维持大东亚的共荣圈”，郭沫若怒斥：表面上假装着一个解放者的姿态，煽动泰国、安南等兄弟民族脱离民主战线，以便于自己的独占，“日本军部是世界上最无耻的欺骗者，他们的所谓共荣圈其实就是劳动集中营，所谓新秩序就是大日本世界帝国，解放是枷锁的别名，自由是奴役的徽号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郭沫若的这些杂文像犀利的匕首与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①。

郭沫若还紧随战争形势的转折变化，分析敌我优劣，坚信日

^① 秦川：《战斗的檄文 民主的号角——郭沫若的抗战杂文》，收入《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论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本必败，以此鼓舞我军士气，坚定抗战信心。首先，我们是正义之战，是“提起正义的剑，举起二十世纪的赤十字军的军旗”，争取民族的生存权，保卫祖国的独立，保卫世界文化和人类福祉，获得了国际支持（《告国际友人书》），而日本的侵略行径则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充分地失掉了全世界的同情”，很多国家因“日本军人的狂暴兽行，都一致地在痛骂他们”。敌人的武力摧残更“充分地激起了我们的民族的义愤和士兵的敌忾”（《抗战与觉悟》），“我们的国民精神，抗战种子，是永远炸不平，永远炸不断的”，在三年来的文化战中，“愈见显示出了为真理为正义而战的纯正文化的光芒”，“我们反文化侵略的斗争，阵营是严整的，声势是雄浑的，步武是刚健的，力量是深厚的”（《三年来的文化战》）。其次，敌国内部矛盾重重，日本军部时常存在分歧，“拖着它向着崩溃的路上走”（《巩固反侵略的战线》）；师出无名，士兵心境颓丧，骄奢淫逸，军纪荡然无存，甚至屡次发生军士哗变，反战形势将像“达到活动期的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鲁南胜利之外因》）；资产阶级也反对日本出兵，因为他们依赖中国这个世界商场（《告国际友人书》）；知识分子因反战而“遭受逮捕的已经有七八千人”，再加上战线延长，牵制甚多，日本愈加恐慌、焦躁、疯狂，“日寇的残暴心理是快要走到末路的表现”（《日寇残酷心里的解剖》）。最后，郭沫若还从科学进化的角度说明日本必败：“日本的军人正是一大批贪食腐肉的蛆虫，他们满得意地替我们吃着腐肉，这正对于我们的下层的生肌，给予了顺畅地发育的机会”，“腐肉去尽，新肌发生，消了毒的大批蛆虫，只好在新兴中国的土地上惨死”（《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由专制而民主，是人类进化的基本动向”，日本“欲以专制政治的堕力阻碍人类社会的进化，不过是猩猩社会之一时的回